

- 文昌帝君
- 迎神祭祀
- 七曲大庙
- 洞经音乐
- 庙会大观
- 古老阳戏

文昌祭祀与梓潼民俗

姚光普

绵阳市文艺创作办公室
梓潼文昌民俗文化旅游区

编

PDG

文昌祭祀与梓潼民俗

姚光普

绵阳市文艺创作办公室
梓潼文昌民俗文化旅游区

编印

责任编辑：广朴

封面设计：广朴

文昌祭祀与梓潼民俗

编印单位：绵阳市文艺创作办公室
梓潼文昌民俗文化旅游区
印刷：绵阳市东升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数：2000册

内部书刊准印证绵新出字第4620号

文昌祭祀与梓潼民俗
PDG

前 言

这是一本关于文昌文化的书,严格说来,这本书所写的内容仅仅是文昌文化的一个方面,因为文昌文化千百年来的积淀,实在是博大精深,要想较为全面地把它写出来,还未达到那种水平。于是,只有拣自己熟悉的内容写,多侧面地展示文昌信仰和与此有关的民俗文化,以便在文昌文化的画廊里增加一页。

本人在梓潼从事文化工作多年,其间有相当的时间在搞文物工作,而七曲山大庙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昌帝君又是大庙的正神,因而年积月累手边就有不少的关于文昌及大庙的资料,再加之八十年代曾组织编辑全县音乐舞蹈集成,对梓潼阳戏及其它民间文化有所了解,经几度酝酿认为有必要写点东西谈自己对文昌文化的认识,但在编写的过程中,我才觉得即使你有丰厚的资料也不一定就能弄懂文昌,于是挑来选去,重点写了文昌祭祀及梓潼民俗等方面的内容,总算成书。但通过这次的写作,我才感到文昌的确是一本难写的书。

梓潼建制历史悠久,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民族文化的精华(如古建)和人文历史的“活化石”(如阳戏),还有许多民间民俗的文化内容,如果进一步去认识和研究它,对于保护

文物、开发旅游、文化交流、发展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梓潼洞经音乐的重新演奏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梓潼的学者刘长荣、黄枝生、敬永金先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史有凯、郝刚、杨克宇先生以及日本的细井尚子女士还提供了部分图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絮叨至此,还有一句,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错漏难免,诚望读者诸君指正。

作者

2000.10.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文昌帝君

一、梓潼神与文昌帝君 (1)

 1. 张亚子与雷神 (4)

 2. 张亚子与蛇神 (6)

 3. 张亚子与羌氏人 (8)

 4. 张亚子与姚苻 (9)

 5. 张亚子与张育 (10)

 6. 张亚子与水淹许州 (11)

 7. 经诰中的张亚子 (12)

 8. 唐朝两皇帝“幸蜀”封张亚子 (13)

 9. 宋朝加封张亚子 (15)

 10. 宋朝道教封张亚子为文昌帝君 (15)

 11. 元代加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
 (16)

 12. 明清两代盛行祭祀文昌 (17)

 13. 星宿神与张亚子 (17)

二、文昌经传..... (21)

1. 文昌经传简述	(22)
2. 文昌帝君阴骘文	(27)
3. 文昌孝经	(32)
三、七曲山大庙	(35)
1. 七曲雄姿	(35)
2. 大庙古建特色及文物	(37)

第二章 文昌祭祀

一、迎神会	(46)
1. 扫荡	(47)
2. 迎神	(49)
3. 祭神	(53)
4. 送神	(55)
二、春秋祀典	(56)
1. 祭前准备	(57)
2. 祭典	(59)
三、旧祭新编	(64)
四、洞经音乐	(69)
1. 何为洞经音乐	(70)
2. 洞经音乐的演奏	(72)
3. 洞经音乐的流传及现状	(76)
五、大兴花灯	(79)
1. 表演习俗和灯具	(80)

- 2. 表演内容和形式 (83)
- 3. 表演特色 (90)

第三章 梓潼庙会

- 一、庙会的源流 (92)
- 二、旧时的庙会 (97)
 - 1. 庙会的宗教祭祀 (98)
 - 2. 庙会的民俗信仰 (102)
 - 3. 庙会的民间艺术 (105)
 - 4. 庙会的社交聚会 (106)
- 三、恢复后的庙会 (107)
 - 1. 恢复初期的庙会 (109)
 - 2. 文化旅游的庙会 (114)
 - 3. 商贸信息活动的庙会 (118)
- 四、对庙会文化的思考 (121)
 - 1. 独特的文化现象 (121)
 - 2. 多功能与广泛的社会性 (122)
 - 3. 庙会文化走向趋势 (124)

第四章 梓潼阳戏

- 一、阳戏神坛与宗教 (128)
- 二、阳戏演出形态 (133)

1. 启坛	(134)
2. 天戏	(141)
3. 地戏	(149)
4. 花戏	(156)
三、阳戏的音乐与面具	(159)
1. 音乐	(159)
2. 面具	(161)
四、阳戏班和阳戏艺人	(165)
五、梓潼戏与梓潼阳戏	(170)
六、梓潼阳戏研究简述	(180)
附:全国文昌庙(祠)对联精选	

第一章 文昌帝君

在四川梓潼城北七曲山上，有一座元明清三代成组的古建筑，殿宇楼阁，雄伟壮观，正殿供奉着高大的铁铸造像，神情威严，两目深邃，这尊铁像就是赫赫有名的梓潼文昌帝君。自唐代以来，这位尊神被唐明皇钦封之后，流传着种种关于文昌的神话，道教把文昌列入神坛并不断加封，于是，许多学者极大地关注文昌的来龙去脉，从清代的曾国藩到现代的文昌研究专家，百多年来从未间断，许多观点各执一词，围绕文昌“是人、是神”争论不休。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话题。但文昌文化及其思想的影响和旧时形成“北有孔子，南有文昌”的局面，这又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特别是本书要研究文昌祀祭文化及梓潼民俗，首先弄清文昌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只有综合各方的看法，结合自己所掌握的有限资料认识这位尊神。

一、梓潼神与文昌帝君

众所周知，梓潼是文昌帝君的“发祥”之地。

梓潼县位于绵阳市区西北部 50 公里处,属盆周浅丘地带,地处川陕要道,又是古金牛道要塞和蜀汉时诸葛亮出祁山的大道,至今有许多三国时期的遗存,如卧龙山、御马岗、书箱石、演武场、张飞柏、瓦口关等遗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梓潼就为蜀国领地,《华阳国志》载,周显王三十二年(前 337 年),秦惠王为征服蜀国,便送五美女和能屠金的“金牛”于蜀王,蜀王派五丁迎之,行至梓潼,见一大蛇入山洞,五丁拽蛇尾出,不料山崩地裂,五丁及五女被压死于山石中,“金牛”惊吓跑至县南石牛堡后变成了石牛。蜀道由此险关顿开,为秦灭蜀打通了蜀道难之关口,这就是著名的“五丁开山”的传说,至今此处山名还叫“五妇岭”,五丁插剑之地早已是一口泉井,终年清泉不断,名曰“剑泉”,“剑泉晚照”为梓潼八景之一。唐代诗仙李白在他的《蜀道难》中,用“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诗句描述了这个流传千古的神话故事。秦汉时,此地因以产梓树最多,潼江水又贯穿其间,梓潼以“东依梓林,西枕潼水”而得名。又传,禹帝治水于梓潼泥陈山伐梓木,其树神化为童子以求禹帝免伐,因此得名。总之,梓潼之名由来十分久远。

秦灭蜀后,梓潼属广汉郡。汉武元鼎六年置梓潼县,西汉末,王莽新朝时期,改“梓潼”为“子同”。东汉末又改“子同”为“梓潼”并置县。蜀汉时期为梓潼郡,晋大安三年,梓潼改县,隋开皇三年,梓潼因设潼州郡,置梓潼县于石牛堡。大业三年废郡,恢复梓潼县名,唐宋以后,梓潼县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梓潼素有“团团万岭,如龙如蛇”之说,古蜀国开国以来,由金牛道相联系,便是通往中原的必经之地。《资治通鉴》称:“梓潼失,成都危”,可见梓潼从古至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1964 年,考古工作者在城西连枝村发掘了一座汉墓,木椁内一大批包括

石器、木马、陶器、铜器、钱币等极具研究价值的文物，由此专家认定，早在汉代，这里就是繁荣之所了。后来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这里都留下了痕迹，如三国时期的瓦口关大战蜀汉军从这里进兵阆中，唐玄宗、唐僖宗“幸蜀”到过这里，李自成在梓潼许州摆开战场大战洪承畴，张献忠三过梓潼与文昌张亚子“联宗”并立太庙等等。

也许梓潼的历史悠久和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才产生了文昌帝君，正是有了这位大神，梓潼的历史文化积淀才更为丰富。

应当看到，文昌帝君的产生并不奇怪。我们知道，神的观念产生于原始社会，是人们不能理解和驾驭自然以及社会力量时，这些力量以人格化的方式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虚幻反映，于是就有了神，长久以来，对神的信仰和崇拜是一切宗教的核心。因此我国神和神权的观念由来十分久远，造神现象十分普遍，“文昌帝君”的形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至于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怎样由梓潼地方小神变为全国性的道教大神，并且在封建社会里有相当的影响，这的确是专家们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造神现象，由于神是造出来的，我们只能研究这种现象而不能知其全貌，造神者们往往把人们带进扑朔迷离的境地，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忽略了事物的本质，再加之宗教和社会的各取所需，以及大量的“神降”、“假托”之笔编造了宏文巨著，时至今日，对文昌帝君的研究也仅停留在传说、神话和一些道家的书典中。这说明，对文昌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而且需要据有说服力的史料。

自晋代起，特别是唐宋以来，记载文昌张亚子的“典籍”说来也不少，如《明志礼四》云：

神姓张亚子，居七曲山，仕晋战歿，人为立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封为帝君。

又如《咸丰梓潼县志》云：

神姓张名亚子，其先越西人，因报母仇，徙居是山，屢若神异。

再如《环宇记》云：

济顺王张亚子，晋人，战死而庙存。

但是，对文昌张亚子这样的“神”虽说他是越西人，仕晋战歿或因报母仇，徙居梓潼七曲，后被历代加封为文昌帝君，但怎样加封、为什么要加封，“典籍”多为神话传说。因此，可否从历史的、宗教的领域去研究，并且通过传说或文昌经文中探知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得出一种现象——造神现象，通过这种现象也许能够认识文昌文化的某些方面。。

鉴于此，关于梓潼神与文昌帝君的来龙去脉实难稽考，也不必费心稽考。这里只能从一些大家熟知的传说和有关资料“并列”整理出来，以了解梓潼神张亚子“演变”为文昌帝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说法还有很多，但主要是这些，使读者有个大概的了解，也算对文昌帝君的“身世”作一简要交待。

1. 张亚子与雷神

梓潼最早的神是雷神。据《华阳国志·汉中篇》说，梓潼县“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岁上雷杼十枚，岁尽不复见，云雷取去”。“雷杼”是传说中雷神用以发霹雳的工具，说明“善板祠或恶子”当是雷

神之名，其祠当是后世七曲山大庙的前身。

雷神的神话相当久远。在我国古代，由于人对大自然认识的局限性，便产生了自然崇拜，认为万物有灵，因而视具有莫大威力的雷电为神也是自然的，对于雷，人们既害怕它，也充满了神秘感。《山海经·海内东经》云：

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

从这十多个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雷与雷神是有区别的，雷泽即震泽，震泽在吴西，即今太湖，文中所述“龙身而人头”指出存在太湖中的雷神，可能是最早描述的雷神形象了。又说在黄帝大战蚩尤中，“得夔牛于东海流坡山，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这里的雷兽即雷神，黄帝即古之雷神。在明代刊本《三教搜神大全》中的雷神木刻画像，就是“龙身人头”形象，人头为尖咀、圆眼、披发，是一副凶恶之像。在我国古代神话的神，这种“人而兼兽”的形象也时有所见，如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刻的“女娲捧璧”和“羲和捧日”，四川新津宝子山出土的汉代石棺画像“伏羲女娲手举日月”，敦煌壁画中的“西王”，以及《山海经》“东方句芒，兽身人面，乘两龙”、“西方蓐收，左身有蛇，乘两龙”、“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等，这种现象，也是人类自然崇拜、图腾的印证，闻名于世的古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石雕就是原始崇拜的遗存。

对于雷神，有许多古著中对其称谓也多种多样，除《山海经》称“雷神”外，《楚辞》又称“雷师”，《云仙杂记》称“雷公”，还有不同地域称“雷王”、“雷神”。屈原在他的《九歌》中还称雷神为“神君”和“云中君”，列为九歌中的第二曲等。《山海经》是上古无名氏所作，它是我国汉代初年形成的书，称为“史地之权兴、神话之渊府”，全

书三万多字,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神话传说,有龙身而人面之神,有虎身而九尾之神,有方面、人身、三足之神,这些神的模样令人不堪设想,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历史、地理、民俗等广泛的知识,保存了不少关于科学技术和自然信息的资料,是古之著名的巫书之一。《山海经·海内东经》中所描述的“龙身人头”的雷神以及黄帝战蚩尤以雷神现身而战败蚩尤,都作为后来张亚子成神的依据。

在古代,雷神又奉为司命之神,具有布雷行雨、赐福禳灾、惩恶扬善、司生司死的功能,足见雷神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神也是最早列为神位的神。《华阳国志》成书于晋穆帝永和四年(公元346年)秋至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之间,可见梓潼先民祭祀“善板祠或恶子”,当在永和元年以前,这种崇拜,无疑是古雷神崇拜的遗俗。

2. 张亚子与蛇神

对善板祠与恶子,历来的研究者们解释不一致,除上述曰“雷神”外还有曰善板祠为地名,恶子是神名的,也有曰是羌氏语音的直译或隐语。但与此有关的另一种说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龙身人头”的雷神并与张亚子有关的线索来。

唐末五代时期有《北梦琐谈》一书,书中记有关于张恶子的传说,云:

梓潼县张恶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西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祠。时人谓为张恶子,其神甚灵。伪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聪明博达,骑射绝伦。牙齿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视。蛇眼而黑色,凶恶鄙衰,通夜不寐,竟

以作逆伏诛，就诛之夕，梓潼庙祝巫为恶子所
责。言我久在川，今始方归，何以致庙宇芜秽如
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庙蛇之精矣。

《北梦琐谈》中关于张恶子的记载是最早见于文字的传说。也是关于“善板词的张恶子”众多传说的一种，这则传说把神话“五丁拽蛇山崩”中的蛇说是西州张生所养，又把相距一千二百年后根据前蜀王建世子相貌而传为蛇精的故事联在一起，并以庙祝为证，让人相信张生乃众蛇之王，神中之神。

再有，上述这则传说提供了张生是西州人，《辞海》曰：西州，南朝梁大同三年（公元 537 年）置，北周改为西宁州，隋复改西宁为西州，唐治所在越西，辖境相当于今四川越西、美姑以南，金沙江以西一带。说明早在“五丁拽蛇山崩”时西州就有位张生，而且养蛇成神，张生的时代应是在周秦时期，约公元前 330 年左右，“五丁开山”的秦灭蜀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这与传说中的文昌张亚子是“十七世为士大夫身”同为一个母题。此外，这则传说还使人相信，张生是蛇神，又是一个读书人（古称读书人为生）。一些道家典籍累累说文昌帝君“先儒后道”，这与传说中的张生是很吻合的。

张生养蛇，元膺成蛇精的故事，有专家分析说，《华阳国志》中的恶子神有名无姓，传说中的张生有姓无名，恰好联系起来就成了有名有姓的“张恶子”神，“恶”可能认为是“毒蛇”和“坏事”，均为丑陋之意，这些作为“雷神”或“蛇神”的称谓实在“有渎神灵”之嫌，因而讳“恶”改“亚”，不管张生究竟为谁，便传为“神姓张，名亚子，又名为恶子，祖籍越西”，成为世俗之妙传了。同时，张亚子既为蛇神，大蛇成蛟，蛟为蛟龙，蛇与“龙身人头”的雷神属性联在一起了，因此，雷和蛇确是“同族同宗”。

3. 张亚子与羌人

张亚子是传说的雷神、蛇神，亚子祠就是雷神祠和蛇神祠，这是梓潼最早的庙。《明史·礼志》及《太平环宇记》中皆有“蜀人立庙祭之”之语。

有专家认为，这里的“蜀人”不是汉人，应为“氏羌人”，民族学家马长寿、赵卫邦二教授所著的《氏与羌》、《川北甘南氏族考略》中认为川西北自冉骊东北、西汉水、白龙江、涪江上游等地，自古为羌氏族居住的地方（羌氏同源），当时属武都郡的武都、故道、平乐道等地，即在今天的甘南天水、武都、文县和陕南略阳、宝鸡及汉水中流一带。属广汉郡的甸氏道、阴平道、刚氏道，即在今天的甘南文县及四川平武、北川、江油、昭化一带。属蜀郡的湍氏道即在今天的松番、茂汶、彭县和岷江上游一带。由于道的划分，可知当时的氏羌正是巴蜀地区的主要居民，甚至巴蜀西南的青衣江、大渡河、金沙江一带的沈黎郡、越西郡及所属的西昌、越西均为氏羌居住区域。这样看来，张亚子是越西羌氏人无疑了，既然是羌氏人，在同属羌氏居住的区域梓潼县立庙（因报母仇、徙居梓潼）又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此外，民俗学专家肖崇素先生在他所著的《梓潼神与羌氏文化》一书中，认为由于传说中的张亚子出身羌氏，在越西彝族流传的史诗中说，彝族曾称他们的祖先系由几滴鹰血滴在龙（蛇）部落少女发上和裙上而受孕所生，人类学家破译这段传说，认为这是鹰部落男子与龙部落的女子交合而生的一段古史的反映。依据这个传说，或说亚子祠或说蛇神祠都无不可，这与前面所述的雷神、恶